

Richard Norton Smith



哈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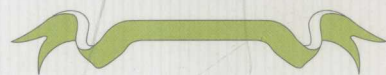
The Harvard Century

世纪

【美】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著
——锻造一所国家大学

100

Richard Norton Smith



H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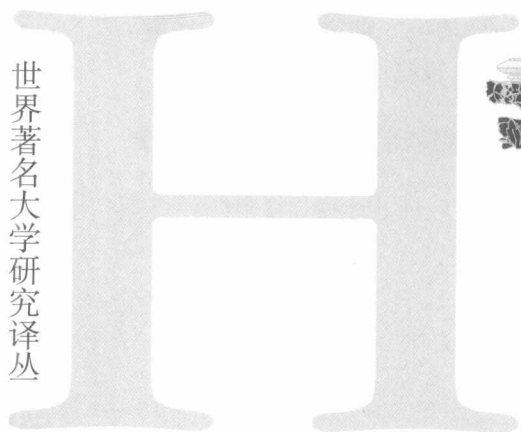
程方平 程玉红 鲜瑜 吕华 熊军/译

陈德彰 郭永新 程方平/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

The Harvard Century

世纪

【美】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著

——锻造一所国家大学

100

Richard Norton Smith

程方平 程玉红 鲜瑜 吕华 熊军/译

陈德彰 郭永新 程方平/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美)史密斯著;程方平等译.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

ISBN 7—80650—265—3

I. 哈… II. ①史…②程… III. 哈佛大学—学校管理—校史—19世纪~20世纪 IV. 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266 号

哈佛世纪

——锻造一所国家大学

史密斯 著 程方平 等译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字 数 26.5 印张 420 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7—80650—265—3/G·267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84181—2127 邮编:550001

哈佛：美国精神和现代大学理念的体现

(译者序)

大概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国人都知道在美国有个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看看满街的《哈佛工商管理》、《哈佛女孩》……就知道人们对哈佛有多崇拜、多迷信了。

今天中国的“哈佛热”首先是从工商管理课程、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和个别领袖人物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等开始的。特别是闵斯特伯格的工业心理学思想、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麦格雷格的人性假设与管理方式、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伯法的管理科学学派、波特的竞争战略研究、沙因的组织文化研究等影响 20 世纪全球管理的经典思想均与哈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哈佛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贡献远不止此，了解哈佛的真实和详细的历史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其实哈佛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甚至几乎夭折走到今天的辉煌境界的。只要翻看一下哈佛的历史，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合情合理、在情理之中，但一切又都是那么超乎寻常、充分体现了哈佛人不懈的奋斗精神。

作者理查德·诺顿以一位学者的良知和科学态度，在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全面反映哈佛成长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其中不仅有哈佛“过五关、斩六将”的风光，也有其“走麦城”的艰辛。他向读者揭示，哈佛今日的辉煌决非天生的，也不是仅仅用“教会学校”、“私立大学”、“学术自由”、“产学合作”、“知识经济”等理由就可以简单说明的，一所大学的成长是极为复杂的过程，牵涉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因此，任何想深入了解哈佛的人

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从中可以体悟到许多、借鉴到许多。

在三百六十五年(1636-2001)的发展历程中,哈佛的起步也是不堪回首的。在刚开始创建时,哈佛仅占有一英亩的土地和约两、三千英镑的资产,小到只有一位教师、四名学生和一间教室,其第一任校长纳撒尼尔·伊顿曾用一根“足以打死一匹马”的胡桃木棍差点把一位教师打死,他的夫人居然往学生吃的玉米粥里掺羊粪蛋,甚至贪污学生的伙食费。致使这对夫妇在上任一年后就被罢免,学院也被迫关闭了近十二个月。在这一不光彩的开端之后,一位年仅三十三岁的青年亨利·邓斯特被任命为第二任校长。当他上任时仅有很少的新生入学,一切都非常艰难。邓斯特首先创立了两年制的博雅教育课程,实实在在地将欧洲传统的教育植入当时还十分落后的美洲大陆,成为第一个相对正规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直到十年以后的1650年,经过励精图治,邓斯特才获得了英王查尔斯二世的皇家特许状,并逐渐形成由法人团体管理的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

作为一所大学,它的历届经营者都有足够的耐心和事业心,都有极强的生存意识和危机意识。哈佛曾经历过财富的得而复失,公司的兴而复亡,政党的盛而复衰……而这所古老的院校却历久常新。早在17世纪,哈佛就顶住了“冒犯”教会的压力,向哥白尼的理论敞开了大门,她的这一壮举比欧洲大学将哥白尼的学说引进高校早了至少一百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亦步亦趋效法欧洲的定式,确定了自身发展的基调。这是哈佛从传统的清教教义统治下步入学术自由的重要标志和转折点。

在保守和创新的争斗之中,随着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一些新兴的大学,如耶鲁大学在1718年就已成为了哈佛竞争对手,位于南方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大学和得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等也有“南方哈佛”的美誉,不少其他的后起之秀也都试图把院校办成“小哈佛”,追赶哈佛依然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的主要目标。今天我们能与哈佛分庭抗礼的学术新贵和名列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就有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霍布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哈佛处于绝对优势和遥遥领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在大浪淘沙的竞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哈佛人认为,他们与其他院校的一个不同点就是,特别关心走下坡路和被国家体制吞噬的危险,有众多的人决心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的确是哈佛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

到18世纪下半期,在北美洲已陆续建立了九所学院。这一切都是哈佛不能忽视的压力,也是其难得的动力。哈佛人非常明确,如果想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通过加强自身的实力与特色,在教育改革的风浪中求生存求发展。在此前的17世纪中期,哈佛已重新调整了教学内容和阅读书目,设立了神学、数学、自然哲学等教授讲座的制度,建立了全美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将地震视为可探索的自然现象,而非“天谴”,学院已开始从欧洲的传统和宗教的阴影中逐渐脱离出来。

到19世纪,哈佛因其拥有一大批知识天才、文学天才和政治天才而使波士顿享有“美国的雅典”的盛誉,学术自由和机构的独立更使哈佛的发展光彩夺目。到19世纪上半叶,哈佛的影响已远远超出马萨诸塞州之外,遍及美国的中部和南部。与此同时,哈佛的基业也日趋牢固了,在克尔克兰、昆西和沃克等校长的努力之下,哈佛的基金已攀升到数百万美元,为大学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特别是在借鉴了当时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后,使象牙塔中的哈佛在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又学到了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法宝,重视理科教育、扩大课程范围、采用选课制、加强研究生培养等成为这一时期哈佛改革的亮点。

进入20世纪,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普西、博克等校长锐意精进、奋力改革,不仅使哈佛的基金从世纪初的两亿美元激增到70年代的8.25亿美元,还使导师制、选修制、寄宿制、男女同校、消除种族歧视、推行科学教育、延请名流讲课、加强基础课、参与经济活动、提高教师质量和待遇等成为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艾略特任校长的时期就曾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的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作为哈佛的另一个传统,就是在哈佛当时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大都认为,

真正的学者是“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驱逐陪伴,让孤独成为你生命中的习惯。然后所有能力就会充实而完满并平稳上升,就像森林里的树木和田野里的鲜花……独立思考,那么所有的地方对你来说都是友好和神圣的”。在醉心于孤独探索的基础上,不仅哈佛的学术地位日趋显赫,也莫实了其自立于学术之林的基础,渐入到自由独立的佳境。

一所私立大学怎么能称之为“国家的大学”?对于在私立大学曾经消失了数十年,才刚刚开始恢复的中国似乎是很费解的事。其实这是因为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私立学校似乎还是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类”,与国有大学是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对于一个以“科教兴国”为立国之本,而且兴办教育的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思想意识是极为有害和极不负责任的。哈佛的发展经历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试想在我们今天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淡漠态度和支持力度的极为有限,很难保证不断送一批“中国哈佛”、“中国牛津”的命运和前程,其中的取舍的确应慎重考虑。

哈佛在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与美国国家的命运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独立革命的大潮中,有八个哈佛人是《独立宣言》签名者,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以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为首,哈佛已有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伯查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等六位杰出人物担任过总统,有亨利·基辛格等担任过国务卿。在科学、数学、文学、哲学、法学、心理学、人文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乃至军事和战略等方面,哈佛也拥有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著名的学者,哈佛无疑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脑”之一。二战期间哈佛参与“曼哈顿计划”和有关原子弹的项目也使得哈佛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哈佛发展的三百多年内,其内部的确有一种卓尔不群、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和风格存在着。亨利·亚当斯曾指出:“哈佛教给我的东西很少,但是她留给我的是思想开阔和无偏见;尽管对事实无知,但却容易接受教导;哈佛的毕业生很少有持强烈偏见的人,尽管他知之不多,但是他的心灵仍然是反应灵敏的,并准备随时接受知识。”“哈佛学院,就她的教育范围而言,是一座温和的和民主的学校。她让所有的年轻人进入到一个让他们成

为受人尊重的公民所要求学习的世界,而且在那里还有他们想好好利用的东西……优秀的特质就是这个学院惟一的成功之处……哈佛有效地培养出一类型而不是一个意愿。如果你成功拥有一个四年的哈佛学院的学习生涯,那么到最后你心中会留下一片空白,一个心灵的水印。”尽管学习和研究知识是哈佛的一个着眼点,但培养优良的特质才是其重要的目标,哈佛要造就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

然而,作为国家大学的哈佛并不是美国国家政策的附和机构和行政干部院校,而是相对独立的思想库。反对越战、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与美国当时国家政策相左的呼声也大多缘起于哈佛。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她从一个无法取代的角度成为美国国家的重要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中心。从教育上的独立到学术上的独立,再到管理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独立,哈佛的历届领导者都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只有如此才能不失去自我并永葆青春活力,不被存有种种弊端的体制所吞噬。

德里克·博克校长在哈佛三百五十周年校庆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和妇女对于更多机会的要求,医疗保健的巨大变化,技术的急速发展都不会吞没美国。最重要的危险仍然是对知识的极端重要性估计不足。”“在所有因素中,正是知识改变了哈佛和其他大学的面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会改变哈佛,但是在面临挑战的过程中,哈佛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创设和不断调整一套适合自己的“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在艰难的发展中,“朋友们为之骄傲,挑剔者为之头疼。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学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甚至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的确,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就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其中教育的发展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动力之一。

在谈到大学的贡献和特点时,曾担任过哈佛大学二十年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指出:“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博克校长则进一步说:“只有大学或类似的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做出批判性决定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阅历可以锻炼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时达到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予学生的真正贡献,而不

是闪闪发光的学校牌子,或其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办学理念,哈佛的衣钵才会历久常新,并不失其创新的本体。

哈佛大学的自身管理,与美国其他的私立大学形式上是大体相同的。其校务领导机构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大学的财务和校务的管理,董事会成员包括一名正校长、五名副校长、一名附属学院的院长、一名司库(会计)和一名秘书。后者由三十名成员组成,其成员多选自毕业的校友,主要负责定期召开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大学的重要活动。在两者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和其相互促进的支持下,哈佛的运行机制是正常的和良性的,而并不是靠对校长的人品押宝。从特定的角度说,这种形式的管理是最适合现代大学的管理理念的,也是哈佛发展历久弥新的重要保证之一。

美国是一个靠教育立国并获得极大成功的国家之一。早在建国之前,一大批有识之士和殖民地的开拓者就在支离破碎的殖民地的荒野中建立了最初的学校。建国前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昧无知而又能得到自由,那么,它所能指望的东西实乃过去从未有过并且将来也不会有。”在国家决策层,人们也视知识是“一个共和国的灵魂”(美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约翰·杰伊语)。因为建国者明白“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能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别能力(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托马斯·杰斐逊语)。具有“实际的理想主义”特质的美国人,从建国之初就致力于谋求教育的平等和培养优秀人才。对于这两个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目标在两百多年的美国教育史中都逐渐得到了实现,而哈佛大学便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的教育王冠上的明珠。她不仅是始终推进美国教育改革的先锋,是美国现代教育理念的体现,而且也为自己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仅从这一点来说,哈佛作为美国大学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当我们在今天审视哈佛的历史足迹时,我们会发现哈佛校徽上“真理”的拉丁文和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拉丁文是多么的熠熠生辉,又是多么的耐人寻味。一个建校三百六十五年的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恪守在自己初建时的信念,这已是十分感人的了,

更何况她还能循着自己的信念不断地创新和升华。

在众多有关哈佛的著作中,我们选择了这本由理查德·诺顿撰写、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并不是因为该书十全十美,而是因为该书的写作更倚重大量的史料,更超脱和客观。特别是我的一些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同行也都十分推举这本书,因此使我更加倾向于这一选择。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我们的译校工作很可能还存有许多纰漏和不足。我们仅希望能以此粗浅的工作为国人了解哈佛及美国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并能得到读者和同行们指教和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学习和借鉴哈佛的成功经验,并不等于要完全效法甚至迷信哈佛,而是要能够寻出规律性、原则性的东西,弄清哪些是特例,哪些是过程中的特殊性,哪些是哈佛在特定的情况下作的选择,哪些是哈佛做事和经营的尺度。选择翻译这本书并不是想在已经温度极高的“哈佛热”中再凑份子,而是想通过书中相对真实的描述为读者提供可靠的案例,促进国人思考自己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和向外看世界的种种经验教训,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要“削足适履”,闹出“邯郸学步”一类失去自我的笑话来。正如原北大校长、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早就告诫的那样,“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试想哈佛若是当年一味地效法欧洲剑桥和牛津,或是在国家温暖的怀抱里享受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特殊待遇,恐怕今天在美国也只能是二三流的大学。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曾对求学者说“学我者死”,其用意并非吓退后学,而是说明学习的根本不在表面的皮毛和形式上的酷似,而要看重其内在的精神和原创性的智慧。形似只会是虚弱的,神似才能树立自我。不可否认,中国和美国在历史、文化、民族性、经济、科技、特别是教育体制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许多差异,但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规律方面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希望读者能读到和悟到其中的奥秘。

程方平

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2003年3月28日

目 录

哈佛:美国精神和现代大学理念的体现(译者序)	(1)
国家与大学(原序)	(1)
致 谢	(5)
访谈对象介绍	(8)
绪 论 思想家和实干家	(10)
第一章 土壤和种子	(27)
第二章 博采众长	(68)
第三章 来自多尔切斯特的契普斯先生	(111)
第四章 科南特先生走向战争	(151)
第五章 红皮书,红色恐慌	(185)
第六章 来自阿普顿的主教	(229)
第七章 风暴中的孩子们	(277)
第八章 德里克·博克的教育	(330)
第九章 寻求凝聚力	(366)
译者后记:美国社会发展与大学的改革	(404)

国家与大学(原序)

在共和国中诞生的国度,从各教堂中独辟蹊径的教堂,从诸阶级中脱颖而出阶级。——伯纳德·德·沃托《哈佛精神》

1986年是哈佛学院建立三百五十周年纪念,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初创发轫三百五十周年纪念。这年的九月,聚集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剧场的人们将以约翰·亚当斯的传统方式举行庆典,很久以前他曾告知他激进的表兄山姆说:“波士顿城市的聚会和我们的哈佛学院推动了宇宙。”哈佛大学走过不算太长的历史之后,将会引起全美国的关注。直至今日,仍和亚当斯时期一样,哈佛依然是卓越的象征,是精英主义的代名词,是以成功与平等为理想的这片土地上一个最有吸引力的目标。

然而,尽管这一最新的里程碑历史源远流长,这些年来人们已为之编写过几百本书,对这所培养出六位美国总统、三十位诺贝尔奖桂冠得主、二十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两百多位罗德奖学者,以及众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州长、大使、学术权威、收税官和证券经纪人的学府进行描写、解释、攻击或辩护。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没有理由再加上一本。但是自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半个世纪以前出版了他不朽的、有关一个殖民地时期该学院的考察以来直至今日,仍没有尝试全面地叙述哈佛的历史,也没有一本书试图将哈佛置于国家的背景之下进行论述,或者去解释国家与学院是如何在并非稳固的联盟及经常性的对立中成长的。他们之间的这种爱与恨交织的关系揭示了许多我们对学识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一个要求专门知识的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态度。他们在搜寻文明的多元性以及威拉·卡瑟所谓的“吵闹的推行现实”的宽容中,终于比双方设想的更多地反映彼此。

一个民族最古老学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H·L·门肯编的著名的美国精神的词典中有三处提到了哈佛,却没有一处提到耶鲁。直到20世

纪30年代,大学并不招聘教授,而只对知名的学者发出“号召”,这是为什么呢?哈佛将自己视为美国教育的发祥地。她创造了有关法律和商业教学的个案学习方法。在美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和预防医学等方面,哈佛也是最早的探索者。

现代的哈佛大学可以将DNA和杂交玉米、血库、避孕药等的发明归功于自己。坎布里奇一个实验室研制出了计算机智能先驱的雏形(主要由美国海军使用的、仅在圣诞节和元旦不工作的一台五十英尺长的“机械脑”)。坎布里奇的其他教室也培养出了诸如托马斯·沃尔夫、约翰·多斯·帕索斯、诺曼·梅勒和约翰·厄普代克等作家;众多的诗人中包括T·S·埃和奥格登·纳什,音乐家弗吉尔·汤姆森和科尔·波特,演员则可举出桑顿·怀尔德、罗伯特·舍伍德、杰克·雷蒙和皮特·塞勒斯等。

1986年的秋天,身穿长袍、头戴学位帽,聚集在校园中庆祝三百五十周年校庆的教职员们可以追忆弗雷德里克·杰克森·特纳和蒂莫西·利里。是这些卓越的前辈们使从科顿·马瑟到阿尔杰·希斯等诸多的大学生们的求知欲得以觉醒和受到训练。

1947年春天,斯泰特·乔治·马歇尔国务卿到哈佛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开始了以马歇尔计划闻名的“欧洲复兴方案”。三十年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登上同一个讲坛大骂西方道德和精神漠然时,记者们曾问他为什么选择哈佛,索尔仁尼琴答道:“哈佛就是哈佛。”^①

这同一所学校成了反叛的年轻人和愤愤不平的总统们的反衬。林登·约翰逊说,由于没进过哈佛,他在外交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会给他带来声望。理查德·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到哈佛时充满了揶揄,他的内阁中四位成员有哈佛的学位。^②

① 恩里克·汉克·洛佩斯,《神秘的哈佛》,纽约,1979,第2页。

② 多丽斯·卡恩斯在她的《林登·约翰逊和美国梦》(纽约,1976)中描写了她第一次遇见约翰逊的情景。那是白宫举行的一次舞会,舞会上那位高大的得克萨斯人确实使她为之倾倒,“你们哈佛人也跳舞吗?”他(指约翰逊)取笑着问。“当然跳了”,她回答道。“吹牛,”他对她说,“我知道在那儿人们干什么,我敢打赌他们没有我跳得这样好。”关于尼克松毫无顾忌地指责学院应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其他反战运动领导人负责的故事参见艾略特·里查森访谈录,当总统诋毁他们的母校时,作为内阁成员之一的他只能听着。

在约翰·肯尼迪执政的年代,哈佛大学有时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的第四个分支,肯尼迪没有做什么来消除这个印象。考虑一下1961年他与当时任他母校校长的同窗内森·普西的遭遇,这两个人的会晤摆脱不了当年六月在肯尼迪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紧张的峰会的阴影。他们的话题很快转到对美国总统的要求之上,以及自一代人之前另一位哈佛人担任总统以来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正如肯尼迪所指出的,“哈,当富兰克林担当总统职务的时候……他并没有面临这么多世界的问题。他只需应付美国境内的贫困问题,可是,看看我却要处理这么多问题”。他的陈述对一个充满傲慢——个人的傲慢、机构的傲慢,以及未了民族的傲慢——的时代,进行了大量的揭露。^①

几年前,一位来自长岛的鲁莽的本科生成为只当了一届的鲁莽的国会议员,他写了一本名为《哈佛憎恨美国》的书。小威廉姆·F·巴克利说,对于约翰·勒·鲍特里尔这本薄薄的书,其标题是最出色的。但是,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再好不过地表达了对坎布里奇湾以外的象牙塔和社会工程师们的不信任。

在哈佛社区之内,许多攻击都来自与勒·鲍特里尔同时代的左翼人士。这些批评把哈佛大学看成是为国外战争辩护的统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压抑坎布里奇的下层,或干脆压抑个性,威廉姆·詹姆斯在谴责“大的祸害”,捍卫哈佛的不可调教正是其最优秀的产物时,想到的就是这种个性。

这些例证也许是丰富多彩的,但只是历史的第一稿。我承认自己的目的更大胆:努力追踪既有地方的色彩又有宗教的神圣,一所地方学校如何脱去其清教徒外衣,宣告自己成为事实上的美国国家的大学。读者会注意到,从技术上说,1986年是哈佛建校三百五十周年,从吸引全球人们的注意而言,她只是一个较年轻的机构。直到美国内战之时,哈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教波士顿的绅士们礼貌举止的学校。哈佛只反映有限的抱负和新英格兰文人的理念,满足于为部长和地方官员们提供自由艺术的基础教育。

随后便到了由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姆·艾略特统治和为代表的扩建发展时代。艾略特,平易近人,年富力强,不再遵循哈佛过去的做法,斩断其杨基佬的根系,开始将哈佛转化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随之发生的一切便是这一历史的核心。它也说明为什么需要用一个新的观点阐述哈佛。

^① 内森·普西访谈录,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口述史项目。

一个从艾略特的公开宣称的目标到德里克·博克校长的法人管理,哈佛最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可以折射出美国社会惊人发展的轨迹。关于权威的定义,关于目标的确立,关于有能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领导的形成,我们的解说是最真实的。帝国已经屈从于共和国。那些舒适地生活在“奥林匹斯山”的人已经为其他的领导者让开了道路。自从美国内战以来,美国已由二十三位总统执掌过大权,在此期间哈佛的命运只被托付给五个人。他们在1937年仍被《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为,因其在美国最重要的办公室里经受的磨难和取得的胜利才使这所学校的传记和对领导层的考察摆脱了旧日的英雄模式。通过外部世界进入哈佛的院墙,艾略特和他的后继者们承诺,大学的院墙终有一天要夷为平地。

致谢^①

所有的文学艺术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都异常渴望培养人性博爱之情。因为他们比任何小说家、戏剧作家或者诗人更需要依靠其他来源为他们提供事实,令他们的判断更加犀利。我在这方面尤为幸运。从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和内森·普西(Nathan Pusey)到最近六位在哈佛担任“艺术与科学院”院长的人,还有几十位法人成员、督学、舍监(House masters)、系主任、教授、学生领袖和新闻记者们,实际上我采访过的所有的人都不吝赐教。许多人慷慨大方,不但付出了时间,他们仔细回顾了自从本世纪初开始以来在坎布里奇的岁月。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哈佛大学严格的“五十年规则”^②使我无法使用浩瀚的哈佛档案馆中最近的文件资料。为了排除这些障碍,我开始尽可能地寻找和采访参与到哈佛最近半个世纪发展的人。他们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他们的回忆成为我这本书中最宝贵的部分。但是我并没有满足于此。除了那些受制于“五十年规则”因而公众无法窥视的文件外,哈佛档案馆还包含浩如烟海的可以公开的文献。感谢哈利·P·霍尔登(Harley P. Holden)和他的工作班子,使我有机会涉猎如此多的文献,包括涉及查尔斯·埃略特(Charles Eliot)和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的收藏品;从艾略特(Eliot)当校长时以来的校友们的出版物;几十年《深红》报^③;还有60年代末期骚乱的年代编撰的大

① “致谢”及随后的“访谈对象介绍”均在原书正文的后部,为读者方便,特移至此。

② 译者注:美国档案存放的一个工作原则,最近五十年的资料是绝密的,以保证历史的公正。

③ 译者注:哈佛校刊,另外,哈佛橄榄球队的队衣也是红色的,自称为“王者之红”。

量文件,那个时候哈佛和美国其大学都经受了严峻的内部考验^①。

此外,我还从国会图书馆中搜索出几千页有用的资料,及从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和纽约的口述史历史收藏馆中觅得其他的收藏品。我非常感谢所有上述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同时我还要感谢无数多年以来对我热情帮助的无数的人们,他们的贡献成为我书中的一部分。观察现代哈佛的工作就有点像观察一个章鱼表演走钢丝。从一开始,我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个结构和陈述的技巧,从而可以向那些从来没有涉足坎布里奇的人解释这所大学,但又不至于使本书的注意面太广泛而忽略了哈佛大约二十五万的校友。

为了这种平衡还涉及一些资料的出处。与我谈话的一些人的名字没有列出来。我在文章中已尽可能地说明了资料的来源,因此减少了本来已经相当长的文章后的注释。尽管不可能——列出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而有几位应该提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德里克·博克校长,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两次采访,谈话涉及多方面内容;还有他的前任内森·普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弗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等几位教务长;还有现任艺术与科学院院长米歇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哈佛近代历史中提到的传奇式人物约翰·芬利(John Finley)、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Perkins)、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以及追溯到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时的历届哈佛法人团体成员(马伯里则是通过与从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领导的监理会开始的他的前任们的谈话中得知有关哈佛的许多内部情况的)。

如果没有詹姆斯·艾略特一家,特别是他的遗孀格瑞斯(Grace)和他的儿子西奥多(Theodore)及媳妇海伦(Helen)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他们使我有机会看到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私人的文件和日记。这些资料揭示了一些二战前后及期间的哈佛校院生活情况,有些情况使人出乎意料。

^① 译者注:1969年哈佛发生学生骚乱,导致当时校长内森·普西下台。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骚乱起源于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讲演运动。在那以后,面对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本科生在大学的地位日益下降问题,如面对星星之火。